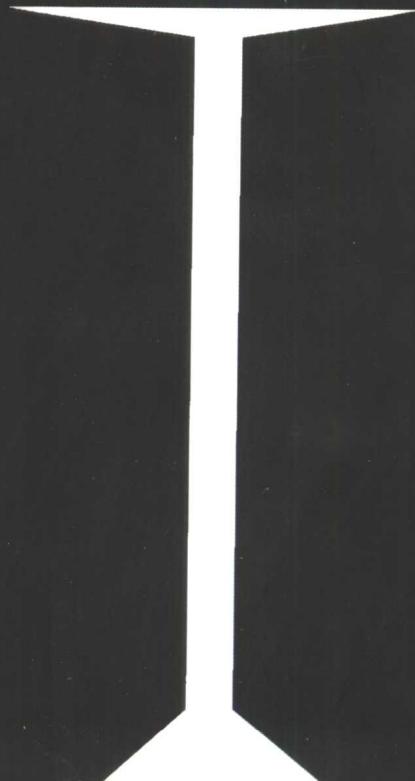


非 神 化

邵燕祥 著

思想者文库

花 城 出 版 社



非 神 化

邵燕祥 著

思想者文库

花 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神化/邵燕祥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9
(思想者文库)

ISBN 7-5360-3049-5

I. 非… II. 邵…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9026 号

非 神 化

邵燕祥 著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广东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1 插页 250,000 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360-3049-5

I·2578 定 价: 15.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者的话

我们在策划这一部丛书的时候，向一些作者发出了
一封约稿信，其中说：

“我们这部丛书回避了‘思想家’这个提法，而用
‘思想者’，还不单是为了谦逊。我们不要求我们的作者都
如同思想史上的那些思想家一样，都有一个自成体系的
原创性的思想。我们自负的是，丛书的每一位作者都在不
断地思考历史和现实，传统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社会与
文化等等这些题目。他们的作品，也是在引导和启发读者
思考这些题目的。编印这样一部丛书的意图，想必可以得
到您的赞同吧。”

“我们从平日阅读的印象中，觉得您是一位在深思着
的作者，所以冒昧相邀，如蒙俯允，不胜荣幸。”

“我们想每册字数二十万至二十五万，基本上从已发
表的作品中选录，最好是发表之后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
响者。不论是否已编入文集，均可选录。只要围绕着‘思
想者’这根主轴，论文、笔记、随笔、杂文均可入选。倘
有未发表过的合适的新作亦可编入，但不作为一项要
求。”

这丛书的编辑意图和编辑办法就是这些。

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应该是独特的，既然号称思想者，就不会与别人雷同。丛书的每一位作者，他思考的范围、题目，他思想的倾向，都各各不同。因此，每一位作者只对他自己的这一本书负责，不对丛书中其他作者的书负责。每人发表的都是自己的意见，并不表示这些意见全是编者和出版社赞同的。

第一批推出六种。假如读书界愿意接受这丛书，我们想接着再编印若干种。我们看见，在这世纪之交，在思考着这些题目的，并不是只有少数人。

朱正 秦颖

1999年3月18日

序

花城出版社秦颖先生来谈，说他们想出一部思想者文库，先出五家或者六家，一人一本，逐步扩大。我以为这是个不坏的主意，表示赞成。于是他就要我跟他一起来操办这事了。秦颖原先跟我同事，老关系了，不好推辞，就答应下来。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确定要约哪些作者的书稿。我们从平日阅读中印象较深的作者们中挑选，不论原先熟识的或者不熟识的。这时，我就想起了燕祥。我写信去，他回信也赞许这个倡议，不过，他又说：“至于我，‘思想者’谈不上，‘议论文’耳。于议论文有时贩卖些从思想者处趸来的现货，却少原创性见解。”这里他是用思想史上思想家的标准来做衡量的尺度。

燕祥在不识愁滋味的少年时候，是诗人。当他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再见于文坛的时候，就不仅是诗人，而且又是杂文家了。说到杂文，就要说到鲁迅传统。鲁迅往矣，不可再得。也是杂文高手的夏衍说：鲁迅以后杂文写得最好的，当推绀弩为第一人。绀弩往矣，不可再得，我凭着对杂文的甘苦也略知一二，要说：绀弩以后杂文写得最好的，当推燕祥为第一人。鲁迅也好，绀弩也好，燕祥也好，他们的杂文好在什么地方？首先，最根本的，好就好在有思想。议论风生之中，时见思想的闪光。思想是杂文的灵魂。没有思想还成什么杂文呢。即使写的是新基调杂文，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却不能没有上级的思想呀。

燕祥不止一次引用过帕斯卡尔的一段名言：

人只是一根芦苇，是所有生物中最脆弱的生物，但这是会思想的芦苇。一滴水可致他死命。但是即使整个宇宙来反对他，他仍然高于自己所有的凶手，因为他能够认识死亡，而盲目的力量是没有意识的。

所以我们的全部优点就在于我们能够思想。

在《大题小做集》的自序中，燕祥对这段引文作了这样的发挥：

人之贵有思想，乃因思想是独立的、自由的；独立思想来自独立的而不是依附的扭曲的人格，自由思想来自自由的而不是禁锢的奴役的精神。为了能够思想，哪怕会像芦苇一样折断，也应是在所不惜。思想会使人的如芦苇一样的生命变得有力，面对“凶手”而高于“凶手”，面对死亡而超越死亡。

我想，即使不能成为帕斯卡尔所指意义上的“会思想的芦苇”，至少我也该做一根会唱歌的芦苇，在晚秋时节唱出心底的悲欢和身历的沧桑，做一根发议论的芦苇，在阵阵疾风中倾吐出肺腑之言的真话吧。

诗人邵燕祥，是一根会唱歌的芦苇；杂文家邵燕祥，是一根会发议论的芦苇；而作为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邵燕祥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这样说，是有他的全部著作作证的。打开他的书，就可以看到他在为苦恼着他的那许许多多问题思考，他也把这些问题提到读者面前，强迫读者同他一起思考。

这里有一个问题：一个思想者的任务，是提出问题重要呢，还是提出结论重要呢？对此，燕祥在《疑难问题》一文中作了这样的回答：

作为后人，如果不能越先人思想的雷池一步，那就叫作没有出息。先人的结论再好，是就当时当地而作；后人哪怕还只是发现和提出问题，尚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但出发和归宿于此时此地的实际，也远胜于停步在先人的结论和答案。

即使还不能提出结论来，能把问题提出来，也就很好了。在思想史上，超级巨星如卡尔·马克思者，他在提出问题方面的贡献，就比提出结论方面的贡献大得多。燕祥的许多文章，只是把

问题提了出来，却没有同时贡献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也许这正是作为思想者的他的一大优点吧。

最后讲一下这本书编选的事。目录是我初步选定的。作者要我提出个初选目录，当然不无道理，因为作为操办者，应该对丛书的要求有较多的考虑，这在我，当然又是责无旁贷。我一面读他的书，一面把目录抄下来。抄完把字数一算，大约超过了一倍。删了一次，还是太多，再删一次，字数才符合丛书的体例。“割爱”一词，通常是客套话，倒是很确切的表出了今天我做的事情。沧海遗珠，不能无恨。只好请有兴趣的读者另外去找他的集子来读了。

朱正

1998年11月22日

目 录

序	朱 正 (1)
有 感.....	(1)
论不宜巴望“好皇帝”	(4)
代自传	(10)
读《丁香花下》札记	(13)
读《白色花》	(20)
关于史诗性作品问题	
——答《文艺报》记者问	(32)
幸存者，但不是苟活者	
——张贤亮《绿化树》读后	(35)
《岁月与酒》自序.....	(43)
“娘打儿子”论.....	(47)
何物“大辩论”?	(50)
然然长大后怎么样?	(53)
觉慧会不会变成高老太爷	(55)
建立“‘文革’学”刍议	(57)
论“七八年再来一次”	(60)
五月话“双百”	(63)
百草有用论	(65)
不安全因素	(68)

无可羡慕

——漫谈孔子和儒学的“走运”

与古今读书人的“不走运” (75)

一样情思 两副笔墨

——漫谈新诗和诗词并行发展的双轨制 (83)

一个悄悄的预言 (89)

国将不国 (91)

有感于胡风案件的平反 (94)

为谭嗣同一辩 (100)

关于错译 (103)

《河殇》现象断想

——从思想参与说到文化启蒙 (106)

避席畏闻篇

——读书札记：关于文字狱的传统 (112)

好在哪里？ (126)

趣味逻辑 (129)

中国还需要皇帝吗？ (133)

喜读《王力病中答客问》 (137)

久违了，王力先生 (140)

读布哈林遗嘱 (143)

批判精神与杂文的命运

——关于杂文史和当代杂文研究的一些思考 (153)

关于《武大郎开店》 (167)

性格斗争 (169)

结论式思维 (171)

接近真实的斯特朗 (172)

纪念俞平伯老人 (175)

我代表我自己 (178)

目 录

下海与挨骂	(180)
如果太平天国不失败	(183)
评“电线杆情结”	(186)
论“只剩下一个人”	(188)
桃花与血	(192)
画蔷小集	(195)
读《我与胡风》随记	(203)
1957：中国的梦魇	(216)
我们将亡于教育吗？	(240)
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斗争	
——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	
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序	(245)
由一个案件引起的思考	
——夜读抄	(251)
卡廷纪念碑	(254)
中国人全都堕落了吗？	(256)
史外说史	(261)
评“红”长简	
——读《残缺的窗栏板》后与李辉书	(266)
闲话孔夫子效益	(282)
疑是“语言奴役的创伤”	(287)
只因他的思想变成铅字	
——《顾准文集》读后感想	(292)
同情高检	(297)
论“真正的共产党人”	(300)
我读“胡说”	(305)
《人生败笔》序	(309)
读几首当代讽刺诗	(316)

非神化

总结一百年.....	(320)
夜读抄	
——读《陈伯达传》.....	(323)
《党内有个李锐》序	(330)
说“神化”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	(334)

有 感

读了报刊上登的张志新烈士的材料，百感交集。惭愧、钦佩、悲痛、愤慨……纷至沓来。

写不成诗，写不成文，只有一些没头没尾的、凌乱不成章的杂感。

面对着张志新同志的遗照，那似曾相识的面影模糊了，我却清清楚楚地看到：张志新的笔被夺去了，因为她正在奋笔疾书，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满怀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忧思，光明磊落地向党陈述自己的观点，披肝沥胆地向毛泽东同志提出自己的意见。然而她的笔被夺去了。

我又清清楚楚地看到，张志新的喉管被割断了，她被剥夺了就义前最后一次发言的权利，她被剥夺了一个共产党员在刑场上高唱《国际歌》的权利，她被剥夺了一个公民向党和祖国、向同志和亲人告别的权利。

我们的笔还在我们手里，我们的喉管并没有被割断，我们还能够书写，我们还能够发声，我们应该怎样运用这属于我们的珍贵的权利呢？

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有一条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原则，叫作“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讳者，隐瞒也。

张志新被割断喉管，则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里一项带现代色彩的凌迟手术。我不知道当时有人对此提过异议没有，而到要公

布这一点的时候，阻力却来了。

对凌迟和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如果遮盖而不揭露，这究竟是为哪一家讳莫如深呢？

当我听到红领巾以稚嫩的童音表示要向张志新烈士学习的时候，跟我听到他们说向雷锋学习、向江姐学习时的感受很不一样。我震惊，我悚然，我感到说不出来的不是滋味，我心里反复地翻腾着两句话，看来似乎矛盾的希望：

我希望有更多的更多的像张志新一样的同志；

我希望不再有像张志新一样的烈士，一个也不能再有！

我不希望再有任何一个忠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何一个正直的爱国者，因为履行一个党员、一个公民的义务和行驶其合法的权利，因为追求真理，因为关心国家大事，因为对党和政府的各级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而被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投入监牢，而被法院判决，党委批准，公开地或秘密地处死，即使死后平反昭雪，即使追认为革命烈士，即使受到表彰和纪念！

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有“五不怕”的革命精神。为了维护人民利益，为了坚持革命原则，不怕降级，不怕撤职，不怕离婚，不怕坐班房，不怕杀头，这诚然是可歌可泣的。然而，如果想方设法不让我们的同志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度里因追求真理、坚持原则而坐牢和被杀，不是更好吗？

是的，假如张志新同志能够借助于民主与法制的庇护而不被杀害，不是更好吗？

我想，假如张志新同志还活着，今天一定会和我们一起思考：不止是号召人们为真理而斗争时要不怕死，而且探索怎样在党的领导下，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消除横亘在征途上的“死地”，使一切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不再成为“自蹈死地”的牺牲。在粉碎了“四人帮”，进一步为实现四化开辟道路的今天，有条件也有迫切的必要来消除这些“死地”了。

鲁迅先生在受到攻击构陷时，曾经满怀激愤地说，他犯的是“可恶”罪。

张志新犯了什么罪？无非也是“可恶”罪。

林彪、“四人帮”不就是常以“可恶”罪杀人吗？

林彪、“四人帮”已经垮台了。正是因此，我们今天才得以为张志新烈士平反昭雪，公开表示我们的哀悼。

问题是，以“可恶”罪被杀或虽未被杀而已在可杀之列的，岂仅一个张志新？

以“可恶”罪杀人或陷入于可杀之列的，是否只有林彪、“四人帮”呢？

不是有人因为正确地批评了某省、某市、某地区以至某县、某公社的领导人，就身陷囹圄，迟迟不得翻身吗？批评对了的尚且如此，批评错了更无论矣。本来，共产党人对于党内和人民内部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尚且要团结，对于反对自己反对对了的难道不更该团结吗？何况批评与反对并不是等同的一回事情。但是，在党的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遭到无情践踏的时候和地方，某些当权者破坏党内外民主生活、破坏党纪国法的所做所为，与这些原则真是南辕北辙！

这些，有的已成为过去，要作为历史经验来总结；有的还是现实问题，应当加以现实的解决。

张志新同志不是徒有其名的共产党员，她如果还活着，我相信她关心的决不是个人的平反昭雪，而是健全党内生活的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改进党风特别是领导作风。她如果死而有知，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她也会死不瞑目的。

1979年6月21日

论不宜巴望“好皇帝”

读者看了这个题目，也许会感到奇怪：时至今天，上距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已经整整 70 年，袁世凯称帝的丑剧和张勋复辟的风波，也已经过去 60 多年，难道还值得像煞有介事地就此立论吗？

其实这个标题是简化了的，求全应作：论不宜巴望皇帝，即使是“好皇帝”。

事出有因：是我写了一篇千字小文，登在《北京晚报》的“百家言”栏，略谓：我们要健全和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首要的是向几千年封建残余影响作斗争，而不能以“清官”和“好皇帝”的标准，取代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领导人的要求。在提到唐太宗李世民“再开明也还是皇帝”以后，我说：“何况，草芥小民尽管巴望的是唐太宗，可难保来的不是宋徽宗吧。”^①

于是，有人针锋相对地指出：“既然唐太宗能使国家富强，百姓安生，我们‘巴望’有一个现代的‘唐太宗’有什么不可呢？”^②

吃惊之余，期期以为不可。

关于唐太宗李世民的评价，本来是历史家的事情，我所知很少，没什么发言权。但是事关我们要不要“巴望”以至拥戴一个现代的“唐太宗”出来，我却要珍重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

^① 《一首宋代的讽刺诗》，《北京晚报》1980年6月14日。

^② 《不能否定好皇帝》，《北京晚报》1980年7月10日。

来之不易的一票的权利，一思，再思，三思，以至“十思”。

唐太宗并不那么可爱， 魏征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我不知道现代的“唐太宗”该是什么样儿的，只知道论者“用发展的、现实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历史”的结果，是“假如拉一位唐太宗时代的人到今天来问，他也会说唐太宗好”。但当时全国有300多万户，一二千万人，上有朱门，下有蓬户，也不知道他想拉一位什么人来。

就以魏征来说，这位大家津津乐道的犯颜直谏的良臣，其实是“伴君如伴虎”，日子并不那么好过。李世民当上皇帝不久，就先打了招呼：“为君不易，为臣极难。我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触之则杀人。人主亦有逆鳞，卿等遂不避犯触，各进封事，常能如此，岂虑有危亡哉！”翻译一下就是，你们可以提意见，但是得有点不怕死的精神。魏征还真有点披龙鳞、不怕死的精神，史有明文；然而，唐太宗听了谏议，退朝发脾气，或酒后吐真言，不满于魏征，甚至想把魏征干掉，也是史有明文的。不过这位“稍逊风骚”的皇帝，倒并不乏权术，且又深通怀柔之道，所以也能大笑解嘲：“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一下子遮掩过去了。有个十几岁的“太常乐人”，长得漂亮，能歌善舞，受到太子宠幸，起名叫作“称心”；这个称心何罪？“太宗知而大怒，收称心杀之”，还株连杀死数人；一桩公案，几条人命，就没听说魏征谏阻，可见这位一生陈谏数百事、包括《谏太宗十思疏》的良臣，有时也还不得不看皇帝脸色的。

原来，早在唐太宗即位的贞观元年，就有人打魏征的小报告，说他“阿党亲戚”，审查了一阵，“查无实据”，搁了下来；贞观十七年，魏征刚死，因为出了另一起案件，唐太宗又怀疑魏征生前